



我的南洋抗战生涯



■张维维 种楠 文/摄

“我生长在新加坡，在异国他乡做了三年零八个月的亡国奴。”90岁高龄的林玲细数着她的过去，那些在异国他乡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过去。

祖国危难，华侨纷纷筹款抗战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郊外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中华儿女纷纷举起抗日的旗帜，抵抗日寇。林玲说，国内轰轰烈烈的

抗日激情，影响了整个南洋群岛。当时新加坡的华人占大多数，拥有4家大报馆和许多“同乡会”。祖国的抗战通过报纸的宣传，让许多在国外的华人逐渐觉醒，关心抗日的消息。1939年至1941年在中华女中读

书期间，林玲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参加筹赈活动，同学们胸前捧着鲜花和筹款箱，晚上到各个娱乐场所门口卖花筹款，支援祖国的抗战。

花季入党，誓与敌人斗争到底

1941年12月8日，日本法西斯发动南太平洋战争轰炸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，把美国军舰炸毁。就在这一天半夜还向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投下炸弹。两个月后日本就占领了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。林玲说：“日军的炸弹炸毁了民宅，我跟着家人逃亡，住在亲戚家。但是许多人无家可归，露宿街头，一片逃亡的景象。我们受尽做亡国奴的耻辱，过着艰难的痛苦生活，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才获得解放。”

随着日军的炮火，林玲在读的中华女中停学了。这所学校的老师大多由国内流亡至新加坡，她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经常跟班里的优秀学生讲解放区的故事，还会借一些进步书籍给同学们看。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，林玲对共产党和党领导的解放区有了认识，对自己的祖国更加热爱了。

林玲告诉记者：“虽然学校停课了，但是我们学生却没有停下抗日救亡的脚步，我的班长提议我参加抗日组织，定时参加组织活动，活动时讲国内外战争形势，有时学习秘密工作守则。”后来经过组织考验，觉得林玲

对抗日的思想坚定，作风正派，生活简朴，1945年3月，她加入中国共产党，8月底在“星洲市委”任委员，负责妇联和宣传工作。

历尽磨难，终迎胜利曙光

1944年日军节节败退，但是黎明前的黑暗总是特别难熬，日寇加紧对人民的镇压。林玲回忆道：“有一天上级组织约在某同学家见面，我按时到了，等了很久，不见人来，我心中焦虑，等待超过半个小时，这已经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，我决定赶紧离开，事后得知联系我的上级已经被捕了，我当时心一慌，决定不能回自己家了，要赶紧逃离，我马上想到要逃到我一个住在郊区的姐姐家去，前后一共转移了四个地方，最终组织上决定以假结婚的名义安置我去另外一个同志家，这位同志后来就是我的丈夫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林玲和先生一起回国了，1952年起在广东省难侨处工作，搞宣传教育工作。1954年难侨处并入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，她在秘书处任文书。1983年从陕西省汉中市汉江机床厂离休，离休后林玲依然坚持学习，并踊跃参加社区开展的学习活动，积极向周围的党员群众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支持改革开放，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。

听杨浦老干部
讲述抗战的故事

15岁娃娃兵跟着队长学侦察



■毛信慧 种楠 文/摄

马超亮1929年12月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一户医生世家，父亲在当地一

家医院当院长。在马超亮的童年记忆里，家境殷实。抗战爆发时，他还在镇江实验小学念书，对于战争带来的影响，尽管时隔多年，仍记忆犹新。

房子被炸生活陷入窘境

战争爆发后，一家人为躲避战乱，从镇江逃往苏北，等再回到镇江时，家

中房子已被炸毁。父亲没了工作，家里也因此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，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。

马超亮说，当时街上总有很多日本兵耀武扬威。在设立关卡的地方，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，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才能通过，不服从的就用枪托打。在学校上课，也没有什么自由，经常会有特务来监视老师上课教什么。有一次上课，老师告诉他们，在农村，有一支一心一意抗日救亡的部队，和老百姓一起同吃同喝。迫于形势，老师没能告诉他们部队在哪里，但这些话在马超亮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
寻亲路上加入革命

1945年，就在家里快要无以为继的时候，一家人接到了二哥从苏北寄来的信，说自己在一家澡堂子里当账房，如果经济困难，就去苏北找他。

接到信后，父亲便带着马超亮一起踏上了去苏北寻亲的路。马超亮所不知道的是，家中这个从小跟着姑母长大的二哥，其实1938年在上海念书时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，之后去了苏北参加新四军。说在澡堂子里当账房，只是不方便说破身份。

到了苏北，马超亮父子三人一路寻找，在江都县仙女庙农村附近，马超亮遇到了新四军基层单位的一位中队长。马超亮主动要求加入区中队，父亲则继续寻找二哥。于是，15岁的马超亮在当年7月正式加入了抗日队伍。

跟着队长当侦察兵

马超亮所在的区中队在被日伪军占领的仙女庙地区活动，他常常跟着当侦察员的中队长一起到仙女庙的外围村庄侦察敌情。比如日军驻扎的仙女庙有多少日本兵，多少伪军，多少武器。马超亮记得，他们的队伍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待，每天都没有固定睡觉的地方，每两个小时就要换，常常一个晚上要转移三、四次。

参军不到一个月，部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，要去攻打仙女庙。“当时我方最多几百人，我所在的中队十几个人，只有七八个人有武器，而敌方有100多个鬼子和1千多名伪军”。马超亮疑惑不解，这怎么打得过？他被安排在距离仙女庙护城河20米左右的地方待命，这次攻打没持续多久就撤退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马超亮惊讶地发现，扬州到江都这一路上的电线杆已全被当地动员的老百姓砍断，日伪军的通讯自此被切断。“那时不懂，现在回想，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游击战术啊。”马超亮说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哥哥找来，把他带到了苏中军区。当时家里人想让马超亮去地方学校恢复学业，但马超亮一心想留在部队学武。1946年，华东野战军军政大学招生，马超亮告别家人，去山东求学。毕业后，调到了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六纵队（陈毅部队），参加过淮海战役等。